

清宮武備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商務印書館

港台書

港

f875.8
2023

清宮武備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主編：徐啟憲
商務印書館

清宮武備

Armaments and Military Provisions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 主 編 徐啟憲
副 主 編 毛憲民 曹連明
編 委 惲麗梅 劉立勇 秦鳳京
攝 影 劉志崗
- 出 版 人 陳萬雄
編輯顧問 吳 空
責任編輯 徐昕宇 黃 東
設 計 張婉儀
出 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 3 號東滙廣場 8 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製 版 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印 刷 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2008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5359 6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 2008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8/F., Eastern Central Plaza, 3 Yiu Hing Road, Shau Kei Wan, Hong Kong.

故宮

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特邀顧問：（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世襄	王 堯	李學勤
金維諾	宿 白	張政烺

總編委主任委員：鄭欣淼

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杜迺松	李 季	李文儒
李輝柄	余 輝	邵長波
胡 鍾	施安昌	耿寶昌
晉宏達	徐邦達	徐啟憲
陳麗華	張忠培	單國強
楊 新	楊伯達	鄭珉中
鄭欣淼	蕭燕翼	聶崇正

主 編： 李文儒 楊 新

編委辦公室：

主 任： 徐啟憲

成 員：	李輝柄	杜迺松	余 輝
	邵長波	胡 鍾	施安昌
	秦鳳京	郭福祥	陳麗華
	單國強	鄭珉中	聶崇正

總攝影： 胡 鍾



總序

楊新

故宮博物院是在明、清兩代宮宮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博物館，位於北京市中心，佔地72萬平方米，收藏文物近百萬件。

公元1406年，明代永樂皇帝朱棣下詔將北平升為北京，翌年即在元代舊宮的基址上，開始大規模營造新的宮殿。公元1420年宮殿落成，稱紫禁城，正式遷都北京。公元1644年，清王朝取代明帝國統治，仍建都北京，居住在紫禁城內。按古老的禮制，紫禁城內分前朝、後寢兩大部分。前朝包括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輔以文華、武英兩殿。後寢包括乾清、交泰、坤寧三宮及東、西六宮等，總稱內廷。明、清兩代，從永樂皇帝朱棣至末代皇帝溥儀，共有24位皇帝及其后妃都居住在這裏。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1914年，北洋政府將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的部分文物移來，在紫禁城內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陳列所。1924年，溥儀被逐出內廷，紫禁城後半部分於1925年建成故宮博物院。

歷代以來，皇帝們都自稱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他們把全國的土地和人民視作自己的財產。因此在宮廷內，不但匯集了從全國各地進貢來的各種歷史文化藝術精品和奇珍異寶，而且也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藝術家和匠師，創造新的文化藝術品。中間雖屢經改朝換代，宮廷中的收藏損失無法估計，但是，由於中國的國土遼闊，歷史悠久，人民富於創造，文物散而復聚。清代繼承明代宮廷遺產，到乾隆時期，宮廷中收藏之富，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到清代末年，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兩度侵入北京，橫燒劫掠，文物損失散佚殆不少。溥儀居內廷時，以賞賜、送禮等名義將文物盜出宮外，手下人亦效其尤，至1923年中正殿大火，清宮文物再次遭到嚴重損失。儘管如此，清宮的收藏仍然可觀。在故宮博物院籌備建立時，由“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對其所藏進行了清點，事竣後整理刊印出《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共六編28冊，計有文物

117萬餘件（套）。1947年底，古物陳列所併入故宮博物院，其文物同時亦歸故宮博物院收藏管理。

二次大戰期間，為了保護故宮文物不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奪和戰火的毀滅，故宮博物院從大量的藏品中檢選出器物、書畫、圖書、檔案共計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運至上海和南京，後又輾轉流散到川、黔各地。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文物復又運回南京。隨着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在南京的文物又有2972箱於1948年底至1949年被運往台灣，50年代南京文物大部分運返北京，尚有2211箱至今仍存放在故宮博物院於南京建造的庫房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故宮博物院的體制有所變化，根據當時上級的有關指令，原宮廷中收藏圖書中的一部分，被調撥到北京圖書館，而檔案文獻，則另成立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負責收藏保管。

50至60年代，故宮博物院對北京本院的文物重新進行了清理核對，按新的觀念，把過去劃分“器物”和書畫類的才被編入文物的範疇，凡屬於清宮舊藏的，均給予“故”字編號，計有711338件，其中從過去未被登記的“物品”堆中發現1200餘件。作為國家最大博物館，故宮博物院肩負有蒐藏保護流散在社會上珍貴文物的責任。1949年以後，通過收購、調撥、交換和接受捐贈等渠道以豐富館藏。凡屬新入藏的，均給予“新”字編號，截至1994年底，計有222920件。

這近百萬件文物，蘊藏着中華民族文化藝術極其豐富的史料。其遠自原始社會、商、周、秦、漢，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歷五代兩宋、元、明，而至於清代和近世。歷朝歷代，均有佳品，從未有間斷。其文物品類，一應俱有，有青銅、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書名畫、印璽、漆器、琺瑯、絲織刺繡、竹木牙骨雕刻、金銀器皿、文房珍玩、鐘錶、珠翠首飾、家具以及其他歷史文物等等。每一品種，又自成歷史系列。可以說這是一座巨大的東方文化藝術寶庫，不但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數千年文化藝術的歷史發展，凝聚着中國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時它也是人類文明進步不可缺少的組成元素。

開發這座寶庫，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為社會提供了解和研究這一傳統的可信史料，是



故宮博物院的重要任務之一。過去我院曾經通過編輯出版各種圖書、畫冊、刊物，為提供這方面資料作了不少工作，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於推動各科學術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一種全面而系統地介紹故宮文物以一窺全豹的出版物，由於種種原因，尚未來得及進行。今天，隨着社會的物質生活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頻繁往來，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人們越來越多地注意到故宮。學者專家們，無論是專門研究中國的文化歷史，還是從事於東、西方文化的對比研究，也都希望從故宮的藏品中發掘資料，以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奧秘。因此，我們決定與香港商務印書館共同努力，合作出版一套全面系統地反映故宮文物收藏的大型圖冊。

要想無一遺漏將近百萬件文物全都出版，我想在近數十年內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在考慮到社會需要的同時，不能不採取精選的辦法，百裏挑一，將那些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集中起來，約有一萬二千餘件，分成六十卷出版，故名《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這需要八至十年時間才能完成，可以說是一項跨世紀的工程。六十卷的體例，我們採取按文物分類的方法進行編排，但是不囿於這一方法。例如其中一些與宮廷歷史、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有直接關係的文物，則採用特定主題的編輯方法。這部分是最具有宮廷特色的文物，以往常被人們所忽視，而在學術研究深入發展的今天，卻越來越顯示出其重要歷史價值。另外，對某一類數量較多的文物，例如繪畫和陶瓷，則採用每一卷或幾卷具有相對獨立和完整的編排方法，以便於讀者的需要和選購。

如此浩大的工程，其任務是艱巨的。為此我們動員了全院的文物研究者一道工作。由院內老一輩專家和聘請院外若干著名學者為顧問作指導，使這套大型圖冊的科學性、資料性和觀賞性相結合得盡可能地完善完美。但是，由於我們的力量有限，主要任務由中、青年人承擔，其中的錯誤和不足在所難免，因此當我們剛剛開始進行這一工作時，誠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評指正和建設性意見，使以後的各卷，能達到更理想之目的。

感謝香港商務印書館的忠誠合作！感謝所有支持和鼓勵我們進行這一事業的人們！

1995年8月30日於燈下

導言

徐啟憲



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百萬件文物中，清代宮廷武備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其數量之豐富、工藝之精湛、材質之優良，是國內其他博物館藏品所無法比擬的。這些武備文物，大部分是清代皇帝御用品，也有少量皇室成員、侍衛親兵和八旗軍兵之物，主要包括冷兵器和熱兵器兩大類。若按《大清會典》之規定，則分為甲冑、弓箭、刀劍、馬鞍、囊韃、槍炮、旗纛、海螺、金鼓、籐牌、戰艦及傳統兵器等幾類。具有時代跨度長，體系完整的特點，是清代政治、軍事以及帝王宮廷生活的縮影，為認識和研究清代政治、軍事、典章制度、宮廷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佐證，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本卷從中揀選了286件（套）具有代表性的珍品，主要以用途、種類和時代為序臚陳，期望能使廣大讀者對清宮武備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一、清代皇帝對武備的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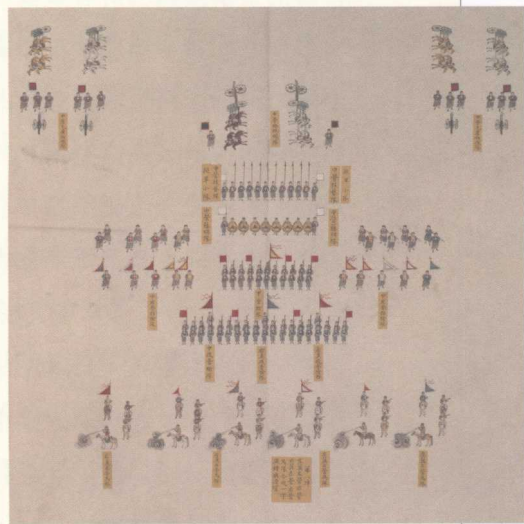
清朝的統治者是滿族人，是一支以圍獵為主的游牧民族，世代活動於中國東北的高寒地帶。滿族的民族特點即是“國語騎射”，所謂“國語”即滿語；騎射即能在騎馬奔馳中射箭中的（箭靶的中心），它是滿族長期狩獵生活中的民族特技。清初諸帝如皇太極、康熙、乾隆等人無不精於騎射，為使滿洲皇室貴族、王公大臣不因生活安逸而忘本，喪失尚武之精神，也為保持八旗軍兵的戰鬥力，他們非常重視武備，經常舉行各類軍事活動。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操閱軍隊和騎射圍獵。

其一、大閱

皇帝親自檢閱八旗部隊，觀看各兵種列陣操練和演練武器，稱為大閱。這一軍事活動，在清朝入關前就已開始。如太宗皇太極時，天聰六年至八年（1632—1634），連續三年在瀋陽北

郊舉行大規模閱兵演武活動。入關後，順治十三年（1656），正式確立皇帝大閱制度：“大閱講武，典之重也。自太祖、太宗以來，舉行已久，今請酌古準今，三年一次大閱。閱畢傳令大臣並侍衛於御前較射、賜宴。次日諸王貝勒率文武各官上表稱賀，以昭大典，著為令。”（《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此後，康熙皇帝也曾多次下旨稱：“國家武備，不可一日懈弛，舊例每歲必操練將士，習試火炮，爾部即傳諭八旗都統等豫為整備，朕將親閱焉。”……“我朝祖宗開創以來，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伐虺安民，平定海內。今朕上荷祖宗庇蔭，坐致升平，豈可一日不事講習？故朕日率爾諸皇子及近侍衛人等，射侯射鵠，備儀備典，八旗官兵以時試肄。朕常臨御教場，歷觀兵卒，等其優劣，賞賜褒嘉，黜陟勸勉，故爾旗分佐領，各個嫻習弓馬，武備足觀。”（《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清代皇帝大閱典禮，一般都在北京南苑舉行。檢閱日，皇帝駕至南苑，總理演兵王大臣及八旗領操都統等率將校軍士，穿甲冑出營成列，侍衛內大臣騎而導，領侍衛內大臣二人扈從於後，侍衛班領率豹尾班執槍佩刀弓矢騎而從。皇帝躬擐甲冑，佩腰刀，背囊韃，騎御馬，先試躬，後檢閱隊伍的列陣和各種武器的操練，閱後賜宴並頒賜官兵等。清前期，除在南苑舉行三年一次大閱兵外，有時還在其他地方舉行閱武活動。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和二十六年（1687），皇帝曾臨盧溝橋親閱試放火器，特別試驗火炮的功能。康熙三十一年（1692）和三十二年（1693），皇帝在京西玉泉山檢閱紅衣大炮、騎步鳥槍及前鋒護軍驍騎營兵。乾隆二十八年（1763），皇帝閱兵於暢春園之西廠，宴請各民族來使並檢閱健銳營、八旗火器營、前鋒護軍，漢軍槍炮陣法。由此可見，清代皇帝將閱兵視為整頓軍紀、加強操練，提高軍隊戰鬥力的重要措施。即使到了清代中後期，國勢衰頹，武備廢弛，仍會舉行一些操練軍隊的活動。如本卷所選《神機營合操陣圖》（圖192）和《武勝新隊攻守陣圖》（圖248附）表現的都是清晚期火器部隊列陣操練的情景。



其二、圍獵騎射

滿族原是遊牧民族，以騎射狩獵為生，形成了善於騎射、勇猛善戰的特點，其所創立的八旗制度，也是一種軍政合一的組織形式，出則為兵，入則為民。這是他們能夠擊敗明朝，創立

帝國的關鍵。清初，騎射作為考核八旗官兵重要科目之一，是維護全國統治和加強武裝力量的一個強有力的工具。八旗上至皇帝、親王、郡王、貝勒、貝子，下至兵丁，都練就一身騎射的本領。清太宗皇太極曾說：“我國家以騎射為業……今若惟耽宴樂，則田獵行陣之事，必致疏曠，武備何由而得習乎？蓋射獵者，演武之法，……爾等時時不忘騎射，勤練士卒。”（《清太宗實錄》卷三四）他認為習武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出獵行圍。入關後，生活環境改變，但康熙、乾隆等皇帝堅持定期到塞外舉行圍獵活動，即嚴格貫徹了皇太極的這一論旨。順治皇帝對圍獵的重要性闡述得十分明白：“我朝原以武功開國，歷年征討不臣，所至克捷，皆資騎射。今仰荷天休，得成大業。雖天下一統，勿以太平而忘武備，尚其益習弓馬，務造精良。嗣後滿洲官兵不得沉湎嬉戲，耽娛絲竹，違者即拿法司治罪。”（《清世祖實錄》卷四八）康熙皇帝也下諭：“一年兩次行獵，專門講武，與行兵無異，校獵紀律，自當嚴明。”（《清聖祖實錄》卷一零六）

當時的皇家圍獵場所多處，大多在今內蒙和東北地區，如吉林圍場、巴彥托羅海圍場、墨爾根岳洛圍場、巴彥喀喇圍場、永安莽喀圍場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木蘭圍場（在今河北省圍場縣），這裡因距承德避暑山莊和京城較近，且林深菁密，水草茂盛，是極好的狩獵之地，在這裏舉行的圍獵活動稱為“木蘭秋獮”。康熙、乾隆等皇帝以身作則，親自參加圍獵，以帶動軍士操練。以康熙皇帝為例，他自幼學習騎射，弓馬嫻熟，又善於火器，除遇國家大事和重要出巡外，幾乎每年都要到木蘭圍場從事圍獵活動，一生累計達40次之多。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69歲高齡的康熙皇帝已到了生命最後歲月，仍前往行圍。康熙五十八年（1719），他總結自己木蘭秋獮收穫時說：“朕自幼至今，凡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猯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朕曾於一日之內，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之人，畢世不能及此一日之數矣。”（《清聖祖實錄》卷二八五）可見康熙皇帝對騎射的重視。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而未能舉行木蘭秋獮，主要是因為複雜的政治鬥爭所致，並非他不重視武備。如雍正十一年（1733）即奏準：“每年立冬後，內務府護軍，每旗各一日，訓練兵二千名，鳥槍兵六百名，分為四日，並上虞處侍衛，鷹狗房執事人等，由內務府總管率領演習步圍。”（《欽定大清會典事例》）這說明雍正皇帝已經注意到八旗兵士的訓練問題。實際上，雍正皇帝在當皇子時，曾常隨父皇去木蘭圍場“騎馬、射箭與使用各種火器”進行狩獵卻是事實。故宮現在仍保存着雍正皇帝當年用過的盔甲、馬鞍、弓箭、火槍等武備器具，本卷亦有收錄，從中可以管窺雍正皇帝重視騎射，尚武精神之一斑。

乾隆皇帝時，舉行的圍獵騎射活動十分頻繁。從乾隆六年（1741）至嘉慶三年（1798），他共到承德避暑山莊50餘次。乾隆三十五年以前，去必行圍，就是在花甲之年後，他還照樣率領滿洲八旗官兵獵捕獸禽。後來由於年過古稀，行圍之舉才日漸減少。在圍獵講武中，乾隆皇帝不僅指揮滿洲官兵奮勇馳逐，擒捕猛獸，而且親自策馬拉弓。曾四次隨扈木蘭秋獮的軍機章京趙翼在《薈曝雜記·聖射》中稱讚乾隆皇帝：“每夏日，引見武官畢，即在宮門外較射。秋出塞，亦如云。射以三番為率，番必三矢，每發輒中的，九矢率中六、七次，此余所常見。”乾隆皇帝一生行圍無數，每有重大斬獲，都會寫詩記之，並將獵獲動物種類、數量刻於所用弓、箭、槍、馬鞭等裝備之上，有時還命宮廷畫家以圖記之。如《乾隆叢簿行圍圖軸》（圖13）就是記載乾隆皇帝行圍時，與衛士一起擒獲四虎的場面。

乾隆時期，承平日久，一些滿族王公大臣沉湎於安逸的生活，不願隨行圍獵，有的官員甚至進奏暫停圍獵，引起乾隆的高度警惕。他下詔說明圍獵練武的必要性：“我朝武備，超越前代。當皇祖時，屢次出師，所向無敵，皆因平日訓練嫻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敵愾，若平時將狩獵之事廢而不講，則滿洲兵弁，習以宴安，騎射漸至生疏矣。……況今升平日久，弓馬漸不如前，人情狃於安逸，亦不同不加振礪。朕之降旨行圍，所以遵循祖制，整飭戎兵，懷柔屬國，非馳聘畋遊之謂。”（《清高宗實錄》卷一三六）乾隆皇帝對一些滿洲王公大臣託詞不去圍獵，甚至無故不到者，嚴加訓斥：“今之子弟，遇行兵出獵，或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事為辭者多矣。不思勇往奮發，而惟耽戀室家，偷安習玩，國勢能無衰乎？此等流弊，有關於滿洲風氣，是以蒙太宗皇帝諒切訓諭。朕此次行圍，諸王大臣中，竟有耽戀室家，託故不願隨往者，朕已為姑容，亦不必明指其人。夫行圍出獵，既以操練技藝，練習勞苦，尤足以奮發人之志氣，乃滿洲等應行勇往之事，若惟知偷安，不知愧恥，則積習相沿，實於國勢之隆替甚有關係。嗣後倘有不知悔改，仍蹈前轍者，朕斷不輕為寬宥。可遍行傳諭諸王大臣及官兵人等知之。”（《清高宗實錄》卷一五一）

康熙、乾隆等皇帝除了攜皇子、皇孫及王公大臣一同圍獵外，為了加強軍隊的訓練，還下令駐防各地的八旗軍兵也要輪流參加。例如，康熙初年，每年調遣12000名八旗兵丁，分三批於三月、十月、十二月，赴口外進行圍獵活動。參加木蘭圍獵的主要是京師、盛京（今瀋陽）的駐防八旗，而杭州、江寧、西安駐防八旗一般不參加。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諭兵部，杭州、江寧、西安等地的駐防八旗，每旗都要派人進行隨圍，以便加強訓練。

可以肯定地說，清代前期所舉行的這些閱兵、操練、圍獵騎射等活動，對訓練八旗軍隊的吃

苦耐勞，提高其戰鬥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康熙年間平定噶爾丹、三藩，雍正年間平定羅布藏丹津叛亂，乾隆年間平定新疆大小和卓叛亂等數次重大戰役，八旗軍兵均能發揮重要作用，是與他們接受了嚴格的軍事訓練密不可分的。到了清代後期，特別是咸豐（1851—1861）以後，同治、光緒、宣統等皇帝都是幼年即位，清王朝內憂外患，國力衰弱，那些滿洲貴族、王公大臣們多已不習騎射武功，祖宗之法更被遺忘，八旗軍兵也喪失了戰鬥力，圍獵活動也就逐漸荒廢了。

二、清宮武備的用途

在清代宮廷中，一切活動都以皇帝為中心，一切人員、用品、器物都是為皇帝服務的，武備也不例外。皇帝尚武，經常舉行大閱和圍獵騎射等軍事活動，則宮廷中的武備，也主要是為此準備的。



清朝皇帝舉行閱兵、圍獵等軍事活動，所需一切武備，如甲冑、鞍韉、刀劍等，都由清宮武備院籌備。如皇帝大閱御用甲冑、弓箭、囊韉、腰刀等，都是按照典制由清宮內務府承作，而且是為皇帝大閱時專用，平時藏於府庫。此以乾隆皇帝大閱甲冑（圖2）為例略作介紹，皇帝大閱冑，牛皮胎髹黑漆，頂鏤空金龍寶蓋嵌珍珠，前後梁鍍金雲龍紋並飾以珍珠，梁中飾金剛石螭蛇。冑上植纓，纓頂端嵌大東珠，纓管飾金蟠龍紋，四周垂大紅片金黑貂纓二十四條。皇帝大閱甲，由上衣、下裳、護肩、護腋、袖、襠等部分組成。通身明黃緞繡彩雲金龍紋，下為海水江崖。甲面有規則的金帽釘。上衣正中懸鋼質護心鏡，鏡四周飾鍍金雲龍紋。兩袖用金絲編織。下裳分左右，腰以布相連，裳面以金葉片、金帽釘、彩繡龍戲珠紋相間排列。其形制與《欽定大清會典圖卷》之規定基本吻合。

前文所舉是乾隆皇帝御用甲冑，實際上清代帝王每人都有自己的大閱甲冑。這是因為，其一、每位皇帝的體態不同，其大閱甲冑的尺寸自然不同。其二、大閱甲冑的制度因時間的推移而有所修改，其色澤、紋飾等都有所變化，到乾隆時期正式確定下來。如康熙皇帝的大閱甲（圖53），其形式與乾隆皇帝的大閱甲相同，但紋飾、色澤及繡法都有所區別。其三、清王朝以“敬天法祖”為其執政原則，下代皇帝對上代皇帝的御用甲冑、冠服等都是珍藏敬收而不服用。並綴以標示，記錄哪個皇帝御用，甲冑的名稱、質地和鑲嵌珠寶數量等。其他如皇帝御用馬鞍、弓箭等武備，也是如此。

由於清代皇帝重視圍獵講武，每個皇帝都要使用大批的弓箭、馬鞍、火槍等，所以在清宮武備中，此類物品數量十分可觀。在這些皇帝御用的武備中，有的記錄着是哪位皇帝使用的，如銅鍍金鏤纏枝蓮馬鞍（圖14），附有滿文的皮籤：“聖祖仁皇帝御用鍍金絲線秋響鞍一副康熙二十一年恭貯”。又如聖祖御用樺皮弓（圖24），上附二個滿、漢文皮籤，一個書寫：“聖祖皇帝通花面油弓 十一力”；一個書寫：“聖祖仁皇帝御用通花面樺皮弓一張 康熙二十一年恭貯”。有的記載着皇帝用此射殺多少隻野禽猛獸，如高宗御用金桃皮弓（圖26），弓面刻有滿、漢文“乾隆十六年，上在木蘭德爾吉圍場射中一狼寶弓”、“乾隆十九年，上在吉林圍場御用寶弓射中一熊、一熊、數鹿”。再如乾隆皇帝御用牛角桃皮弓（圖28），弓面上鐫刻的滿、漢文記載了乾隆皇帝在五年時間內，用同一張弓，射中了十五隻鹿、二隻麕。還有的記載着皇帝寫的詩文，以記錄皇帝使用時的情況。如御製“射熊行”馬鞭（圖17），是乾隆皇帝在圍獵時，用弓箭射殺熊時使用的馬鞭，為此，乾隆皇帝作了一首“射熊行”詩，由其子永璇書寫，再由內務府造辦處，將其鐫刻於馬鞭玉柄上而成。

清宮中還有一些武備，雖然不是皇帝御用，但也和皇帝有密切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八旗兵士穿戴和使用的盔甲和弓箭。皇帝不論舉行閱兵大典，還是圍獵以及宮中御園的護衛，都要有數目眾多八旗兵丁參與，他們的盔甲均由杭州織造局製作，再由清宮武備院籌備發放，其形式、尺寸都有嚴格規定，以保證軍隊裝束的整齊劃一，以壯軍威。據

《大清會典》規定，八旗將校、兵丁的盔甲都是鐵質的。兵丁甲為上衣下裳，內襯布，外綴鐵葉。最初，八旗兵丁都是穿着鐵葉甲參加各種軍事活動的，負重較大，行動不便。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為減輕士兵的勞苦，下詔凡在皇帝大閱時，士兵操練演陣不再穿鐵葉甲，而穿綿甲，這就開創了八旗軍綿甲之制，“八旗額設鐵盔鐵甲，將三分之一改造綿甲二萬件，收儲備用，另造不用鐵葉綢面金釘盔甲一萬八千餘副，以備大閱合操之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八旗盔甲都是綿甲，為皇帝大閱時八旗兵丁穿用，如本卷所選八旗盔甲（圖62），皆以綢為面，藍布為裏，內絮薄絲綿，面飾有等距銅鍍金圓釘，與《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相符。





最後，這裏還要提一提清宮武備中的火器。火器主要指火槍、火炮，明代軍隊編制中已有神機營，專用火器。清軍在進軍中原的戰役中就曾慘敗於明軍裝備的“紅衣大炮”。到了清代，火槍、火炮與弓箭一併被列為清軍三大武器裝備，為歷朝清帝所重視，“我朝武備整齊，弓矢槍炮最為軍營利器，法製精良，百世不易。”（《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其中，火槍（因其發機處龍頭翹起，形似鳥首又名鳥槍）尤以迅猛準捷，衝銳折堅，攜帶方便，不受地勢限制，而被廣泛裝備軍隊，成為清軍武備中首要利器之一。入關前，清軍武器裝備主要以弓箭、長槍、刀、藤牌為主，入關後，順治朝即成立了專門的鳥槍兵兵種。康熙朝時議定：八旗步兵二萬一千餘名，其中鳥槍步兵就要佔一千七百三十七名。康熙二十二年（1683）將軍瓦代奏請增加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正黃旗四旗兵額，每旗前鋒營各增加鳥槍兵一百名。隨着鳥槍兵在軍隊中的增設，建立一支專門操演火器的軍隊，以適應戰爭形勢的變化已十分必要。此後，各省營伍不斷擴建鳥槍兵，以利實戰。康熙朝中期，全國部分省份已紛紛成立鳥槍兵，所擁有的鳥槍已超過五萬餘支。清前、中期，官兵使用的鳥槍幾乎都是火繩槍，火繩槍點火發射裝置的主要構件是槍機，發射時，先將機頭夾鉗的慢燃燒火繩點着，使其成為火源，然後扣動扳手，銜火繩的槍機下砸，火繩頭便點燃了火門盒裏的烘藥，從而引燃管內的火藥產生爆炸，將彈射出。由於鳥槍使用慢燃燒的火繩點火，所以可以連續使用而不致熄滅。又由於有了扳機，只要扣動扳手，便可連續點火發射彈丸，因而提高了發射速度，增強了殺傷威力。但火繩槍有一致命的弱點，容易受天氣潮濕影響，風雨之際更是無可奈何。道光時期，軍隊開始部分裝備燧發槍和擊發槍（俗稱銅帽槍），燧發槍是利用火石砸擊火鏢產生的火星點火發射，而擊發槍是用擊發槍機撞擊火帽而點火發射，由燧發槍發展而來，這種火槍，火門是全封閉式的，徹底解決了火藥防風雨潮濕的問題。

可以說，清自入關始，注意加強造兵機構，健全生產制度，嚴格軍品管理，內務則例章程完善。康熙親征噶爾丹，乾隆建立了“十全武功”，使他們注意到了新式武器——火槍，在戰爭中的巨大作用，所以宮廷非常重視對火槍的收藏，“藏之武庫，以記武成”，以此作為赫赫武功的見證。故宮博物院宮廷武備庫珍藏有康熙、乾隆御用火槍，其來源一是由西方傳教士或皇親國戚所進獻；二是由內務府的養心殿造辦處所屬槍炮處所製作。這些槍，由皇帝敕命並審閱、欽定，被列入典制，是皇帝專用品。如康熙御用自來火二號槍（圖211）、乾隆御用威捷槍（圖217）等皆屬此列，其特點是造型獨特，製作精良，裝飾豪華，突顯皇家氣派。

三、清宮武備的多樣性

多樣性是清宮武備的一大特點，除了宮廷造辦處專門為皇帝製作的武備之外，還有國內各民族、各地方的貢品，以及由其他國家輸入的刀、槍、火器等。細觀之，清宮武備的多樣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清宮武備品類的多樣性。清宮武備品類多樣，如刀類，據《欽定大清會典圖》記載，主要有：皇帝大閱佩刀、皇帝吉禮隨侍佩刀、皇帝隨侍佩刀、王公佩刀、職官佩刀、順刀、雲梯刀、刷刀、挑刀、偃月刀、朴刀、片刀、割刀等。這些不同樣式的刀，都有不同的用途，如順刀為前鋒營左右翼用；刷刀、挑刀為藤牌營、漢軍、直隸綠營用；寬刃、偃月刀、朴刀、片刀、割刀等為綠營所用。再如木柄槍類，有阿虎槍、長槍、鈎鐮槍、雙鈎鐮槍、蛇鐮槍、十字鐮槍、雁翎槍、虎牙槍、火焰槍、手槍、釘槍等，其中阿虎槍為虎槍營所用；長槍為健銳營、護軍營、驍騎營、綠營所用。同一類武器，不同軍隊所用亦有區別。如長槍，據《欽定大清會典圖》記載，健銳營所用長槍，通長一丈三寸，刃長九寸，圭首，中起棱，木柄長九尺，圍四寸六分，旁銜鐵刃如刀，貼於槍下，長一尺四寸，周五分，下綴木圓珠，黑旄，末鐵鑄長四寸。護軍營、驍騎營用的長槍，通長一丈三尺七寸，刃長一尺一寸，蓋為鐵盤，厚二分，下注朱旄，木柄長一丈二尺二寸，末鐵鑄長四寸。綠營用的長槍，通長一丈四尺，刃長七寸，柄長一丈三尺，圍三寸七分，木質，髹朱注朱旄，末鐵鑄長三寸。其他傳統兵器如矛、戟、叉、鏜、耙、鈎、斧、鉞、鐮、錘、鞭、棒、盾等等，舉不勝舉，本卷專有“傳統兵器”一類供讀者欣賞，此處就不再一一詳述了。

其二、清宮武備中有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武備。一方面，滿族本身就屬於少數民族，清宮之中，自然不會少了滿族的武備。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滿、漢、蒙、藏、回等幾十個民族和諧共處，宮廷之中也有許多各地少數民族進貢給皇帝的武備。如鐵鍍金玲瓏馬鞍（圖 72），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七十歲萬壽盛典時，西藏地區政教領袖——六世班禪額爾德尼進獻給乾隆皇帝的。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禪請章嘉國師代奏，要求進京朝覲乾隆皇帝，並祝賀其七十萬壽。乾隆皇帝十分高興，下詔於承德避暑山莊外仿照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為班禪建須彌福壽寺，作



為其居住和講經之所。乾隆四十四年六月班禪率眾僧及馬隊兩千餘人離開扎什倫布寺，經一年多的時間，於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到達承德。乾隆皇帝不僅數次接見和宴請了六世班禪，而且還與班禪一起到須彌福壽寺講經說法，並參加了須彌福壽寺的開光儀式。六世班禪進獻給乾隆皇帝佛塔、佛像、祭祀法器珍貴禮物。這些禮品，是中央政府與藏區親密關係的歷史見證。

在數量眾多的少數民族武備中，有一件渥巴錫進腰刀（圖 148）和土爾扈特腰刀（圖 146），其來歷很值得介紹，它們是蒙古土爾扈特部落首領渥巴錫進貢給乾隆皇帝的。土爾扈特是新疆漠西蒙古厄魯特四部之一，長期遊牧於塔爾巴哈台及其以北一帶。明朝末年，土爾扈特首領為躲避厄魯特蒙古內部的衝突，率本部大部分人員，並聯合和碩特、杜爾伯特部分人員，共數萬眾越過哈薩克草原，遠涉到伏爾加河下游地區遊牧。到康熙年間，其遊牧地區已擴大到數千公里。土爾扈特雖遊牧在數千里之外的伏爾加河流域，但始終眷戀故土。乾隆三十五年（1770），土爾扈特為擺脫沙俄統治者的殘酷壓迫和鎮壓，首領渥巴錫率領部眾 16 萬餘人，踏上了返回祖國的征程。渥巴錫率眾衝破種種阻礙，歷時半年，行程萬里，人員傷亡過半，牲畜死亡殆盡，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終於實現了回歸故土的願望。乾隆皇帝對於土爾扈特的歸來十分重視，首先解決土爾扈特歸來後的缺衣少食、飢寒交迫的生活困境，然後為其劃定遊牧地區，其三解決土爾扈特部落的管理問題，編立旗盟制度。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土爾扈特首領渥巴錫等人到承德進覲乾隆皇帝，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隆重接待，賞賜渥巴錫等人頂帶冠服，敕封渥巴錫為烏納恩素珠克圖爾舊土爾扈特部卓哩克圖汗，其他人等封為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並數次宴請渥巴錫等人。同時，乾隆皇帝還特意撰寫了《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兩文，用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刊刻於石碑，立於山莊普陀宗乘廟內。乾隆皇帝每次接見和宴請渥巴錫等人，都有大批賞賜，而渥巴錫也向乾隆皇帝進獻貢品，其中就包括這兩把腰刀。



其三，清宮武備中有一定數量的外國武器，如刀、劍和火槍等。刀劍等多為朝鮮、琉球、廓爾喀（今尼伯爾）等周邊國家之物，也有西洋國家的，如英國、荷蘭等，也有些兵器還未考證出是哪一個國家所進，火槍則主要來自西洋國家。這些兵器進到清宮後，其中有些又經內務府進行了改裝，成為“中西合璧”的武備。在這些武器中，英國人馬嘎爾尼來華時呈進給乾隆皇帝的火槍，最有歷史意義。